

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丛书

孙冶方的 “最小——最大” 经济理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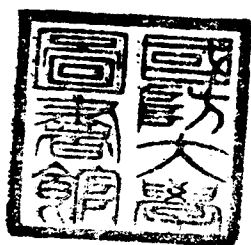
经济日报出版社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 经济理论研究

王鹏程 于双庆

汪海波 彭 昊



经济日报出版社

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丛书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经济理论研究

王鹏程 于双庆

汪海波 彭 昊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7,000字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6-008-3/F·20

统一书号：4454.020定价：1.20元

怀念孙冶方同志（代序言）

张劲夫

我和冶方同志相识是在1936年，我们是在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的。冶方这时已是知名学者，在上海一些进步刊物上，主要是在薛暮桥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刊物上，时有文章发表。当时上海出版有不少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的主编人，常在“功德林”、“觉园”素菜馆一类地方邀请撰稿人吃饭，一面吃饭，一面约稿，我也曾被邀请参加过这类约会。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冶方不在场，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同志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谨严，不轻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冶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分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引起我尔后对冶方文章的重视。这里顺便表述几句我对东莼同志的怀念。他和冶方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都下过苦功，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东莼同志翻译的。当时他在文化界熟人很多，在工商界、政界中也有不少社会关系，因此在这

G00596/13

些人中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他出了不少的力，做了很多的事。对当时象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帮我们做了许多我当时难以做到的事。而且他对地下党组织很尊重，凡我们提出的要求，如请他出席我们组织的集会演讲，到我们举办的训练班讲课，为我们办的刊物撰稿，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都很认真负责履行他的承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路青年会组织“五四”纪念会，他到会演讲，热情洋溢，说理透辟，语言生动，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欢迎，反应很强烈，说明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但彼此都很忙，一直未能畅叙。他去世时，遗愿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我也未能去向他告别。只有把他赠我的经过订正后再版的《古代社会》，好好保管，有时翻翻学习，借书思人，以表示我的哀思和怀念。

抗日战争时期，我到新四军做政治工作。1941年冬，少奇同志在去中央工作前，于苏北盐阜区单家港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新四军二师由罗炳辉同志和我去参加。冶方这时改名宋亮，在华中局宣传部担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来又任华中党校教育科科长、理论教员；我们又见了面，冶方曾写过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强调要重视学习理论。少奇同志回了他一封信，登在华中局的内部刊物《真理》上，这就是那篇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少奇同志去延安后不久，约在1942年秋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迁到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华中党校也同时迁来，冶方也来到淮南。在1943年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成立淮南区委，津浦路东、路西分别成立地委。冶方这时希望参加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到路西

地委担任宣传部长。我们部队这期间有时在路东休整，有时去路西作战，我和冶方经常能够见面。我的印象，当时不论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是在部队工作的同志，对“宋亮同志”都是比较尊重的，认为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我们的好教员。

全国解放后，我在华东财委工作时期，又有机会能和冶方在一起工作，这是很愉快的。大区撤销后，冶方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统计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见解，在实际工作上也做了不少扎实的事。以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专心致志结合中国实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他多年来刻苦钻研所积累的理论素养，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问题，就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在一些会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发言，比之三十年代，这些文章和讲话内容，更具有分量了。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都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是在内部印发。其中有好几篇是事先送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是我鼓励他印送给领导同志的。当时我在科学院工作，五十年代，经济所的党组织归科学院党组领导，而在六十年代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所的党组织，都归中央宣传部领导了，这是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中宣部同意而作这样改变的。虽然我和冶方在六十年代后已无工作关系，但因熟悉而又比较意见相投，因此，他在这期间写的几篇重要文章，都送给我看并征求意见。孰知到1964年后，他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选登在

《内部未定稿》上)却被陈伯达作为批判的对象,并判定冶方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又根据这些文章把冶方“封”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给冶方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等等大帽子,而且把冶方关押了七年。“疾风知劲草”。就在这样的高压逆境下,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据理力争,即使在牢中,也不屈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1975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后,冶方这时被“解放”出狱就医,我们又见了面,彼此都感到久别重逢的欢愉。他的身体虽已衰弱,但精神状态很好,好象从未经历过什么厄运似的,如常叨叨絮语。这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对大局的忧虑,彼此都心照不宣,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错,是毫不含糊的,并表示了要继续研究这些问题的决心。在“四人帮”垮台后,冶方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名誉。冶方就更加放开喉咙说话了,“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等许多重要文章,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逐一公开发表了。他以往未能公开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用冶方自己的话:“因祸得福”。因为要作为批判材料,登在《内部未定稿》上的那些文稿,又亏冶方在上海的一位老战友,冒险保存下来,因此未被销毁,而又能重新印出。这就是冶方在1979年出版的那本《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文章,又于1982年印出一本《续集》和《续集》增订本。冶方这一时期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几次到外地参观、讲学,多次出席学术会议发言,又整理他多年研究的旧

稿，还就当前的实际问题著文发表意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忙。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几位得力助手，他说已找到了几位，所里对他也很关怀支持。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他的健康状况日趋衰弱，以后就检查出有癌症，住进了医院。我在安徽工作时，每次回京开会，都要去医院看他。他很乐观，明知有不治之症，也毫不放在心上，仍在病床上思索如何整理他的旧稿，对老战友来见，仍健谈如昔。一直到1982年冬，他的病情恶化，关心他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都想去医院见一面，去的人很多。我这时已回京工作，因忙未去。他可能已觉到自己为时不多，向其亲属提出，怎么劲夫未来看我。我听到后，急忙赶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已不大能动，但很有感情地把一本新印的《续集》送给我，并坚持象上一本那样，要在扉页上写上要我指正几个字，签上自己的名，写明日期是1982年12月27日。他的手在颤抖，但写的字，一笔不苟，写得如往日那样端端正正。这一情景，十分感人。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与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虽难说是知交，但确是一见面就很谈得来，而且可以谈一些知心话。我对冶方不仅看成是益友，而且认他是我的良师。我半路出家搞经济工作，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问题，是从冶方的著作和言谈中，受到了许多教益而加深理解的。冶方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上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造诣很高，具有真知灼见，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独到的见解，他自己曾说，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这当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同时也反映他的谦虚。因为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

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对不少重要问题发表不少创见，不是人云亦云，而能做到“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结合实际的本身，就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定的创造性见解。因此对冶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要请专家们实事求是地经过科学论证，给予应有的评价。冶方有些未印的遗稿，我没有都看过，已印出的文稿，读得不全，体会也不深，因此说不出很多见解。但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织，在冶方逝世前不久，正式宣布冶方是模范共产党员，我十分赞成，并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因为在我 and 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感冶方在许多方面是我要向之学习的典范。

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冶方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结合中国实际，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我所说的创见，有的是别人未提过的，有的是别人也提过，而以冶方提得最早，或属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提出的这些创见，有些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久就受到批判和折磨，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如计划经济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计划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要按价值规律组织生产资料流通。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把它的商品从价值上分为 c 、 v 、 m 三个部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冶方把 c 、 v 、 m 用之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把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价值上分为三部分： c 是物质消耗， v 是活劳动消耗的报酬， m 是剩余产品，社会主义也要多创造 m ，即扣除物质消耗、活劳动消耗的报酬后，要多创造出剩余产品，社会主义才能日益富裕。贯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是什么？要不同于

政治教科书，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于哲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总产值”不能成为指标体系的中心环节，用“净产值”在计算上也有困难，“净”而不“净”。冶方认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他说：净产值和利润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后者比前者多扣除一个工资只有更“净”了些（净产值是马克思公式中的 $c+m$ ，即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通常我们所说的利润或盈利只是 m 中的一部分），因此，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他也知道用利润考核有许多复杂因素要解决，如价格要合理，级差地租要征资源税等，但他认为不应因迁就宏观经济上的现实情况而不前进，而应逐步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他和我面谈时，还提出率“牛鼻子”的想法。这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有些关系未理顺，这个“牛鼻子”不大好牵。冶方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具体运用到经济领域，主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是大权，应高度集中，而属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事，是小权，应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有自主权，具体地说，他一直反对折旧集中，认为应留给企业。后来又主张提高折旧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要不断更新换代，反对复制古董，这都是很有道理的。我后来向他解释，可以集中一部分调剂，因有的企业有病无药钱，有的企业无病有药钱，但我很同意冶方的观点，不能把折旧基金看成是财政收入，不能挪用于搞基本建设，而仍应用于搞老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冶方还有许多重要观点，如重视流通领域问题、积累率问题、体制改

革问题等，就不一一列举了。象这样一些难得的真知灼见，竟然遭受批判和戴上那么多“帽子”，冶方一直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甚至感到好笑，如批他“最小……最大”，是不要政治挂帅，否认阶级斗争。冶方说：我觉得很好笑，我想，不讲最小最大，那么能够倒过来讲最大最小，以最大的耗费来取得最小的效果吗？冶方对他自己的正确观点，一直坚持到底，毫不退让，这不仅说明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为着维护真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对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同时也说明，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掌握到手，有真才实学，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是一位道德、文章两皆高的杰出经济学家，他的品德风貌，形象是高大的，他的学术文章，是光彩夺目的，他在“立德”和“立言”两方面都是很杰出的。冶方的文章和讲话中是不是也有错误呢？他对这一点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曾几次指出自己的错误，说他曾受到过“左”的影响，反对过让企业利润留成，也不赞成搞奖金。他很诚恳地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他在逝世前的文章中，在和去看他的同志谈话时，一再要求经济所的同志和经济学界的同志，对他的文稿中还有哪些错误，恳切希望提出批评。这说明冶方不仅在坚持真理方面是典范，在修正错误方面也是典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冶方还有一些创见，属于学术上有待探讨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他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社会主义存在两种所有制时要起作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两种所有制不存在时也要起作用，按他的话说，那时是更高的社会化大生产，凡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价值规律就起作用。这是属于探讨性的见解，可以进行讨论

的。至于他对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见解，也是属于探讨性的，是一时难以定论的，他并不要求别人附和而且主张存同求异，欢迎和大家共同探讨，这反映冶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属于探索性的科学问题，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的。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冶方于1923年就参加共青团，去苏联学习过，属于我党建党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我的前辈。但他在革命经历中，几经坎坷，几次挨整过。经过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生活的锻炼；经过炮火纷飞中的战争生活的锻炼。他一直倾心于理论研究，在工作需要时，即服从组织分配，参加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和经济实际工作。对职务安排，从来毫不计较。至于个人生活一直很俭朴，从来未计较过待遇。他遭遇过多次折磨，但从来未听到他有什么怨言和牢骚，一直精神爽朗，也从来未见到过他垂头丧气。他总是乐呵呵地、劲头十足地在钻研、探索，到了他构成有根据的看法时，他就发声说话了，著文印发了。想的是如何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有利，而从来没有考虑个人会有什么后果。即使在遭受挫折后，也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挫折似的。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我行我素，直来直往。既不迎合，也不拉扯。平易近人，热诚待人。只有人亏待过他，从未听说他亏待过别人。从冶方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境界，是纯真而高尚的。他的精神风貌，象水晶那样透明，朝霞那样灿烂。和冶方相处，在可亲中令人可敬，在平凡中显其伟大。因为他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经过长期磨练，看不到他

还留下什么私心杂念，只有一颗赤诚的心。他是名副其实地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尚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三是战士兼学者的典范。冶方的治学精神，刻苦严肃，他研读经典著作，十分重视原著。他能掌握外语工具，是其方便条件，他对翻译的书籍，一遇含义有疑之处，一字也不放过，要查阅原著，有时还要从几种外文对照，以求准确。为此，他改正了好多翻译不准确的字句。至于对原著的精神实质如何领会，各个人是有不同的，冶方是力求读懂，符合原意。在我接触到的学者中，我认为冶方是对马、恩、列原著真正读懂的一位，我自己就深感有许多地方没有读懂，一有机会，就想向冶方请教，而冶方确实比我懂得多。真正弄懂，还在于用，而冶方结合中国实际，是运用得比较好的一位学者。他不是抄书、述书，而是在用书，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确实做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前面已提到一些。因此，冶方不是述而不作一类的人，而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冶方这位学者，首先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他是为革命而学、而用，他主要是用笔来作战的。冶方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学者，更重要的，首先他是一名战斗英雄，在再大的压力下，他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表现出他不仅是坚强不屈的战士，而且是无私无畏的英雄。他的模范事迹，和许多模范共产党员有共同之处，但又有他独特之处，这一独特之处，就是冶方是具有重大学术成就和很高声望（在国外有些国

家，他的声望比国内还高）的学者——这样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很有学问而又有很强的党性，在这一点上，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冶方逝世后，我很赞成一些老战友和经济学界的同志、朋友们，举行冶方经济学术讨论会，举办“冶方奖励基金”。冶方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研究、发扬。冶方的道德风范，为人师表，更应受到我们的尊敬学习，尤其希望青年一代，要以冶方为榜样，好好向冶方学习，为我们的宏伟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冶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拉杂追叙一些往事，表述一点粗浅看法，以表示我对冶方的哀思和怀念。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冶方生前的学生和助手：刘国光、孙尚清、何建章、张卓元等同志撰写了一套《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丛书》，分别对冶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论》思想的发展、经济效果理论、流通理论以及治学方法和态度等进行了论证，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他们能够比较如实的表达冶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我高兴地以我这篇冶方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作为这套丛书的序。希望这套丛书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经济理论水平，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原载198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最后一段是1984年5月13日加的）

前 言

孙冶方从大革命年代起，为了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以最少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取得最大量的为社会需要的产品的经济思想，是他一系列独创性见解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纵观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可以这样说，“最小——最大”是构成他经济学说的核心。这是孙冶方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透彻分析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所付出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遗留下来的宝贵理论财富中最具代表性思想。“最小——最大”经济理论，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因此，现在，我们怀念我国这位著名经济学界前辈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宣传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学习、讨论、宣传他的“最小——最大”经济理论，让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更好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既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些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本小册子也是想在这方面尽一点微薄的义务。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形成

及其主要内容..... (1)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唯意志
论和自然经济论及其严重后果..... (1)

第二节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形
成过程..... (20)

第三节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
主要内容..... (33)

第二章 “最小——最大”理论在孙冶方经

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41)

第一节 “最小——最大”理论是孙冶方
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41)

第二节 不能曲解孙冶方的“最小——最
大”理论..... (76)

第三章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实

践意义..... (90)

第一节 孙冶方“最小——最大”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90)

第二节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15)
第四章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129)
第一节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中的矛盾.....	(129)
第二节 孙冶方某些政策建议的局限性.....	(144)
第三节 正确对待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中的问题.....	(151)
后 记.....	(168)